

文艺美学丛书



后现代主义 文化与美学

王岳川 尚水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艺美学丛书



后现代 主义 文化与 美学

本丛书由
文艺美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编辑

王岳川 尚水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王岳川 尚 水 编

责任编辑:张凤珠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390千字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301-01652-2/1·262

定价:9.70元

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

(代 序)

王 岳 川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学者们的注目。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源起（时间）、定义、基本特征、以及在哲学、美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却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因此，有必要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及其论争作一全面的鸟瞰，并从总体上把握其深层本质：文化精神。

一 后现代主义：源起及其理论景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而现代西方文化也经历了一次次新的裂变，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这个时期，各种文化哲学理论都陷入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次变。随着一次次理论撞击和兼容，后现代主义逐渐露出自己的头角，并迅速扬弃现代主义而成为风靡当代西方的“显学”。后现代主义的迅速崛起反映出西方文化流向的新变化，也标示出它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承续”的逻辑必然性。因此，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成为二十世纪文化发展和精神流向的内在轨迹。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这一发展轨迹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成为整个文化逆转问题的焦点。这个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后现代主义源起的时间及其分期；二是后现代主义究竟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还是现代主义的继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究竟是什么？

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化近半个世纪的激荡之后，西方文化氛围和思维逻辑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 30 年代以后，它的内部诸多流派的松散组合的离心力以及自我发难和颠覆，加速了现代主义运动的解体。后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的母胎中发生发展起来，它一出现，立即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不同寻常的逆转和撕裂，引起哲人们的严重关注。

后现代主义绝非如有人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文艺思潮。这种看法既不准确，又与后现代发展的事实相悖。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倾向，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由这个高度去看文艺思潮，才会有一种新的文化“语境”，才会使其内在精神逻辑呈现出来。进一步说，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高视阔步导致了合法性危机（利奥塔德）。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本文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从此，后现代文化与美学浸渍了无所不在的商品意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在此归于失效，商品禀有一种“新型”的审美特征，而文化则贴上了商品的标签。复制、消费和平面感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代码。

在后现代兴起的时间上，理论家们各持己见，至今未达成理性“共识”。但撮其要，其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美国后现代主义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后现代转折》（1987）中认为，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弗·

奥尼斯 (F. Onis), 他在其 1934 年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中, 首先采用 Postmodernism 一词。随后, 费兹 (D. Fitts) 在 1942 年编辑出版的《当代拉美诗选》中再次使用此词。这个词同样也曾出现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哈桑一直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和概念的最坚决的捍卫者, 他认为, 后现代主义真正兴起的时间是以乔伊斯的《芬内根的守灵》(1939) 为其上限。而评论家奥康诺在《大学新才子和现代主义的终结》(1963) 一书中, 将英国 50 年代的“大学新才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开端。理查德·沃森在《论新感性》(1969) 中, 则把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品钦和“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看作后现代兴起的标志。德国当代文论家 M. 柯勒在《后现代主义: 概念史的考察》(载《美国研究》第 22 期, 1977 年) 中则更进一步地探讨了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历史沿革, 提出了对“现代”、“后现代”、“当代”三个术语划分的标准。

当代重要思想家和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利奥塔德、杰姆逊、斯潘诺斯也对分期问题提出自己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看法。贝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 是社会形态在文化领域的反映, 因此,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 60 年代; 哈贝马斯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兴起于二战以后, 是一股反现代性的思潮, 必须加以对抗; 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知识状态的集中体现, 因此, 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否定, 所以, 他把后现代的兴起看作是 60 年代中期的事; 杰姆逊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 标志着对现代主义深度模式的彻底反叛, 其兴起时间是 50 年代, 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有着内在逻辑一致性。当代美国思想家斯潘诺斯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复制”, 其世界观是一种重偶然性、重历史呈现性的“机遇”, 其兴起时期应追溯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

在后现代主义兴起问题上, 提出比较中肯切实意见的, 是荷

兰学者汉斯·伯顿斯。他在与佛克马合编的《走向后现代主义》(1986)一书中,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经历了四个衍化阶段:1934—1964年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开始应用和歧义迭出阶段;60年代中期和后期,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一种与现代主义作家的精英意识彻底决裂的精神,禀有了一种反文化和反智性的气质;1972—1976年,出现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概念日趋综合和更具有包容性。这一发展轨迹,显示出这样一种内在逻辑:“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特有的风格,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在某种情境中,这意味着复活那被现代主义摈弃的艺术风格,而在另一种情境中,它又意味着反对客体艺术或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东西。”^①

总结上述种种说法,基本上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胎(30年代)中,^②并在二战以后与母胎撕裂,而成为一个毁誉交加的文化幽灵,徘徊在整个西方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正式出现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其声势夺人并震摄思想界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阶段,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一场世界性的大师级之间的“后现代主义论战”。到了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开始表现狂躁以后的疲惫,声势大减。据此,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之“后”,将是“新历史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但这一看法,尚未得到其他学者的证实。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风靡欧美的文化思潮,使当代西方各种

① 柯勒:《后现代主义:概念史的考察》,载《美国研究》,1977年第22期,第13页。

② 伊哈布·哈桑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体现在这样一份名单上:斯泰恩、赛德、布莱克、劳特蒙、兰波、雅里、左拉、霍夫曼、简杜根、斯坦恩,后期乔伊斯、庞德、杜桑、阿达德、鲁赛尔、巴塔伊、布洛切和卡夫卡。见哈桑:《后现代转折》,1987年英文版,第88—89页。

问题和困境在大暴露的同时，又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场“革命的冒险”和“后现代转折”。这种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已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领域。可以说，当代一流思想家无一不是站在思想最前沿问题上展开后现代主义论争的。要一一列出这一思潮所及的领域和有卓著建树的理论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对后现代主要范围及领域的代表人物加以扫描式的鸟瞰，以期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

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思想家及其学者有：伽达默尔、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利奥塔德、弗·杰姆逊、拉康、德里达、福科、德勒兹、马尔库塞、斯潘诺斯、海登·怀特、库恩、费耶阿本德、纽曼、布朗等等。

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有：罗兰、巴尔特、伊哈布·哈桑、伊格尔顿、洛奇、洛德威、佛克马、克利斯蒂娃、沃夫冈·伊塞尔、保尔·德·曼、米勒、布鲁姆、哈特曼、G. 格拉夫、阿兰·威尔德、J. V. 哈拉里、霍尔·福斯特、林达·哈奇、诺米·谢奥、苏珊·桑塔格、莱斯利·费德勒、瑞查兹·沃森等等。

文学（小说、诗歌、戏剧）领域的后现代作家有：约翰·巴恩、W. 布洛格、T. 品钦、D. 巴特姆、W. 埃比希、J. 艾什伯里、大卫·安亭、S. 什帕特、R. 威尔森、K. 冯内库特、J. 霍克斯、尤内斯库、J. 波格斯、M. 本森、塞缪尔·贝克特、欧也尼·奥尼斯科、乔杰·路易斯、鲍杰斯、F. 纳波科夫、哈罗特·品特、B. S. 约翰逊、雷纳·海彭斯托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兰·罗伯-格里耶等等。

艺术（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电影、摄影）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有：约翰·凯奇、斯托克豪森、P. 布雷兹；劳申伯格、J. 丁格里、J. 布衣斯、J. 施那伯、皮戎；L. 查尔兹、T. 布

朗、M. 蒙科；R. 文途里、C. 詹克斯、B. 波林、C. 摩尔、M. 郭瑞夫斯、E. 波菲子；K. 杰可布什、A. 瓦黑尔、A. 库克斯；D. 里昂、H. 卡拉汗、E. 温斯顿、J. 扎柯斯基，等等。

当然，这份名单是极不全面的，但起码通过这份名单，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到当今世界沸沸扬扬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轮廓。

反过来说，满足于这种“面”上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停留在诸如后现代起源的时间、定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期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范围的规定上，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只有进一步切入大师们的“后现代论争”氛围中，在思想的辩驳和批判的尖锐交锋中，去看当今西方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庞然大物究竟有了什么样的困境？应怎样解决？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透过论争所形成的巨大“语境”，看到后现代主义来临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去发现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精神和文化逻辑。

尽管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后现代论争时间长、范围广，但仔细分析，仍可以看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当代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尤尔根·哈贝马斯、利奥塔德、弗·杰姆逊以及哈桑和斯潘诺斯。而且，他们之间所形成的排斥性哲学话语，构成了后现代论争的重要理论景观，他们相互的驳难和答疑勾勒出后现代的文化逻辑曲线。可以认为，只有对这几位大师的思想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对这构成美、法、德众多学者多边冲突的论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

二 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矛盾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是得后现代风气之先的人。1973年,贝尔推出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①率先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入手,直观后现代文化,占据了对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全景阐释的优越地位。

贝尔指出,之所以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而不叫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或专业社会,乃是侧重于指出西方社会仍处于一种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旧的社会关系、现有的权力结构,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都正在迅速消蚀。动荡的根源来自科技和文化两个方面。如果说,过去社会的“伟大修饰语”总是一个“超”字;超悲剧、超文化、超社会,那么,今天我们似乎已经用尽超字,而只能以“后”(post)字取而代之。诸如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后意识形态、后文学文化、后历史人类、后匮乏社会。因此,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用“后”这一个缀语,一方面是对业已逝去,另一方面也是对尚未到来的未来先进工业社会感到迷惘的“生活于间隙时期的感受”,意在说明人们正在进入的一种过渡性时代。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不前不后的“过渡间隙感”,贝尔意识到世界正处于新变革的前夜,而美国则已经先行看到新的曙光。据此,贝尔否定以生产关系划分社会形态,而主张按工业化程度把世界分为三种社会,从而展开了他自己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美国)是不同于前工业社会(亚非拉各国)和工业社会(西欧、苏联、日本)的新型社会。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在前工业社会中开展的“意图”是同“自然界的竞争”,它的资源来自采掘工业,它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生产率低下;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为技术环境;后工业社会的“意图”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纽约,1973年版。

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从时间视点看，前工业社会具有面向过去的倾向；工业社会着重考虑适应性调整，强调根据趋势作出推测和估计；后工业社会具有面向未来的倾向，强调预测。因此，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组织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一个“中轴”。后工业社会意味着新中轴结构和中轴原理的兴起：从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信息或知识社会；而且在知识方式上，抽象的中轴从经验主义或者试验成败的修修补补转变为指导发明和制订政策的理论和理论知识的汇编。

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一书中，更进一层地展开对后现代文化的研究。贝尔将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相加而成。他提出三领域对立学说，作为自己文化总体批判理论的出发点。认为历时 200 多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形成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三个领域之间价值观念和品格构造方面的矛盾将更为尖锐。

贝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简单地排列社会领域的矛盾形式，而是紧紧围绕“文化”这一中心，展开后现代文化剖析。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压迫局面下，变革缓慢的文化阵营步步退却抵抗，强化自身的专利特征和自治能力。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全面侵占的处境下，呼吁为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划界”，以争得一块合法生存的地盘。但文化本身的积淀性和扬弃性，完全不同于科技的革命性和创新取代性。科技以不断推翻陈说、标新立异而高歌猛进；而文化却不能完全丢掉自己立足其间的历史和传统，相反，它步步退却（寻根），不断返回存在的本源去发现生活的意义。

贝尔从新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主义的精神裂变、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展开批判。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冲动力被导

入高度拘束性的品格构造，它的精力都用于商品生产，并形成一种惧怕本能、自发和浪荡倾向的工作态度。在美术和文学中，资产阶级的趣味也倾向于平庸无聊的英雄崇拜。而艺术家则不断自我膨胀，以人取代上帝，对功利、专制、拜金主义深恶痛绝，大加挞伐，并以其全新的叛逆姿态，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逐步形成与经济体制分庭抗礼的“文化霸权”。造成这一畸形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两面中的“宗教冲动力”因遭科技理性的打击和“世俗精神”的贬斥（剥离神学外壳和斩断超验纽带）而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冒进的尺度本身，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渎神成为社会世俗化的节日，这个畸形的社会因丧失了终极意义的给出而使人生变得没有目标和意义。

现代主义不断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然而这些“主义”现在成了“明日黄花”，所有的“主义”（isms）现在都成了“过时论”（wasms）。没有中心，有的只是边缘。现代主义在这疯狂的一浪压一浪的渲泄中耗尽了自己，创造的冲动逐渐松弛，反叛已经成为秩序，批判也已沦为空谈。现代艺术开始丧失它的批判力量，象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徒落下一个反叛的外壳，其原有的刚健的震惊力萎缩成花哨浅薄的时尚，它藉以哗众取宠的实验性和超脱感也日益琐碎无聊，甚至，艺术试验形式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

贝尔对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推进而达到的现代主义巅峰状态——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认为，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它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贝尔站在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后现代精神、文化、美学、文艺批评等多方面考察，认为成为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极端扩张而导致的文化霸权局面，它意味着话语沟通和制约的无效，鼓励文化渎神与信仰悼亡。

在贝尔看来，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更“现代”，是现代主义

的推进，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后现代主义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和反思，张扬非理性，这必然导致对本能的完全依赖；艺术成为一种游戏。后现代主义打破了现代艺术的界限，认为行动本身即艺术，艺术即标新立异；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消失了，艺术所允诺的事，生活就会加以实践；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是艺术种类分解的更深入的一个方面，绘画转化成行动艺术，艺术从博物馆移入环境中去，经验统统变成了艺术，不管它有没有形式。这一进程大有毁灭艺术之势。

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感觉方式的革命，而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这是一种以反文化为其内容的新文化，对传统文化而言具有特殊的历史蕴含，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

后现代美学是一种视觉美学。视觉美学否定艺术的单一等级观念，视觉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方面。电影、电视、声音和景象造成的巨大冲击力、眩晕力，成为审美主导潮流。视觉艺术为现代人看见和想看见的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这与当代观众渴望行动、参与、追求新奇刺激、追求轰动效应相合拍。至此，传统艺术解体了。后现代主义抨击传统艺术所保持的观念：艺术不是生活，因为生活是短暂的、变化的，而艺术却是永恒的。后现代主义则认为艺术和文化的轨迹，已经从独立的作品转移到艺术家的个性上，从永恒的客体转移到短暂的过程中。艺术不再是观照的对象，而是一个行为，一个事件。这标志着艺术家感情化艺术魅力的匮乏，已经退化到直接震动感官的地步。

贝尔在分析了后现代文化特征以后，对其文化混杂倾向和所谓“反文化”的偏激冲动表示深切的忧虑，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贝尔认为，后现代社会中人所具有的两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导致人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

的错乱，而宗教信仰的泯灭，超生希望的失落、以及关于人生有限、死后万事空的新意识铸成自我意识的危机。后现代艺术的冲动原是想超越这些苦恼：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剧——去开拓无限。可惜，它的动力仅仅出自激进自我的无穷发展精神，因此，当它以破碎的艺术去对抗破碎的世界时，就已注定它最终无法将心灵的碎片重新聚合起来。这样，人们就走到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

因此，必须重新拥有一种新宗教或文化学科。因为尽管现代文化处于混乱之中，我们仍能期待某种宗教答案出现。在贝尔看来，宗教是人类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生存“总秩序”及其模式的认知追求；是对建立仪式并使得那些概念神圣化的感情渴求；是与别人建立联系、或形成一套将要对自我确立超验反应的意义发生关系的基本需要；以及当人面对痛苦和死亡的定局时必不可少的生存观念。

贝尔相信，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出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再是自然和机器问题，而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新宗教在人际关系和个人对社会的重新认识上，可以修复人们破碎了的信念，从而成为维持社会统一的精神支柱。唯有重建精神崇拜，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贝尔一再强调精神价值的重要，希冀重建新宗教，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

然而，贝尔的新宗教似乎并不能解决后现代文化失落的问题，甚至，他那新保守主义的立场和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矛盾态度，引起了另一些学者的不满，更多的学者加入沸沸扬扬的后现代论争之中。

三 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

如果说，贝尔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并揭示出后现代文化矛盾，最终以走向新宗教为归宿的话，那么，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则是从批判哲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为什么人们急于通过“现代”这一历史处境走向“后现代”。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力图弄清楚，现代性为何成了问题，遭遇到危机？现代性是否已经终结？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尚未完成，它具有开放性，远未终结。因此，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

哈贝马斯认为不能走向贝尔所谓的“新宗教”，而只能走向重建“新理性”，在知识的可靠性和意识形态批判上（合法性问题），建立交流活动理论，从而重振现代性。哈贝马斯后期集中力量讨论后现代问题，他在《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1981年）和《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剑桥）中，抨击贝尔和利奥塔德各自不同方面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呼吁从左右两个方面抵制后现代主义的进攻：一面是以贝尔为首的美英新保守主义将现代危机归罪于文艺现代性，并对其加以驯化规约；另一方面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福科、德里达、利奥塔德的过激反叛和消解，导致对理性的全盘否定。以理性为标志的现代性出了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展示出对现代和后现代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成为半个世纪理论风云的焦点。

自启蒙主义以来，理性就成为哲人们至上的权威，理性成为传统学术领地上供奉百年的君主。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空前惨祸，惊魂未定的哲人痛感理性的脆弱，人们开始怀疑启蒙和理性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率先以《启蒙辩证法》（1944年）一书，拉开了对启蒙进行

审查和批判的序幕。其后，马尔库塞从左翼（激进）、哈贝马斯从中路（折衷改良派）、福科、德里达从右翼（保守派）对启蒙进行了清理或批判，并各自得出不同的结论。

哈贝马斯继承批判理论精神，考察工具理性膨胀后的启蒙意识形态的强硬推进造成社会制度的颓变。他认为，历史哲学所持有的历史发展必然产生进步的乐观主义观点是“不足取的”，^①而马尔库塞科技发展而人性沦落的技术悲观主义的观点同样是片面的。^②在马尔库塞看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科技，而在于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机构。哈贝马斯看到了西方现代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但他不同意到近代文化母体中寻找肇因，将标志西方近代文明的“启蒙”“理性”当作祸源的作法。他并不认为近二百年来带领整个西方文明进入现代文明高峰的“现代性”大潮——启蒙、理性、正义、主体性、人本学就此会突然枯竭。他要考察现代性危机，同时，也要彰明向“现代性”进攻的进程。哈贝马斯的问题现在是：后现代是何以被提出的？向“现代性”进攻的历程是否能说明后现代必然成为可能？“后现代性”的提出，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而现代性是否真的终结？哈贝马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哈贝马斯认为，必须首先弄清楚向现代性进攻的历史发展脉络，才能更深一层地去审视“现代性”的命运。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从启蒙运动诞生以后，就不断遭到进攻，黑格尔是使“现代性”产生动摇的关键人物。而到了近代，这种进攻在黑格尔后学、尼采，以及尼采后学那里愈演愈烈。哈贝马斯通过谱系学分析，指出二十世纪后尼采主义以两个方向进一步发展了后现代性。一条是法国哲学家巴特勒（G. Bataille）、德勒兹和福科的“新尼采主义”，另一条是德里达、福科等人的“解

①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法兰克福，1971年版，第336页。

② 同上书，第347页。

构主义”。

哈贝马斯对黑格尔、尼采、后结构主义这一条对现代性进攻的历程加以清晰地勾勒，指出这是就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和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必须加以清理，重振“现代性”。

在对向“现代性”进攻的历程研究之后，哈贝马斯感到后现代思潮其来有自，不可轻视。为了捍卫“现代性”，哈贝马斯对向现代性“进攻”进行批判，在批驳的基础上，提出“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必须重建“现代性”的观点。

“现代性”在黑格尔后学、尼采及其新尼采主义、解构主义的攻击下，导致主体性丧失、同一性消解、整体性解体、中心消散，而最终导致“哲学的终结”（the end of philosophy）。^①

“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主体性尚未充分发展，它仍在“权力”概念中闪现出“生命”的底色。启蒙以来的理性也未被完全消解，仍与“话语”粘连。而且，“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计划”，^②它是向未来敞开的，它的启蒙理想尚未实现，它的使命尚未完成，它的生命远未终结。加上“后”这字词缀去超越“现代性”，就目前来说，尚为时过早，一切研究都应沿着“现代性”的道路前行。

哈贝马斯认为，自己必须成为“当代性”法庭上的辩护人——为现代性辩护，捍卫其合法性，并以此来抵抗以贝尔、利奥塔德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他认为那些标新立异的年轻人，打着后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英文版，第三章。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新德国批评》，1981年冬季号，第22期。